镜城（书摘）

□罗伟章

《镜城》，罗伟章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7月

白杨树在车窗外或紧或慢地奔流，枝柯上挂着喜鹊窝。天空晦暗，并不见喜鹊，树上挂的，是它们留给自己的念想，哪怕此生此世再无归期。司机侧脸瞅我一眼，说："家和家园，都是一种病，你看那些喜鹊窝像不像肿瘤？"我心虚得不能答言。我觉得他是在说我，是在用一句阴阳怪气的聪明话嘲笑我。其实他提到的病与我无关，我就是一粒流沙，不让自己扎根，因此才离家远行。但就是心虚。没承想刚踏入镜城，那些在画家笔下"鹊登高枝"的吉祥物，就为我挖了个陷阱。

我不想表露，做出欣赏的样子，迎接扑面而来的钢铁丛林。

正看得眼花，头猝然向前一冲。

西南门到了，我该下车了。

尽管我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我的目的地。

街道像狂风里的眼，眯成一条缝——不是困倦，是在审视。这条从嘉靖年间熬过来的石板街，在镜城算不上老人，只能算个中年人，正进入更年期，情绪坏，明显不喜欢我这个生客。我慌忙钻进一条胡同。胡同倒是亲切而真实。胡同出去是条小街，因为瘦，显得长，中段左侧，立着一轮满月，那是把街道和居民区隔开来的门。我在门边站下来，将牛仔包从肩上移到手上，让自己显得恭敬些，再进到月亮里去。里边是长排板式楼房。沿逼仄的通道走过两个单元，或许是三个，感觉横着走没意思，便脚步一撇，上楼。楼道发出的响声，旧到时间的背面去，并用它的旧提醒我：即使回到前世，你也与这里无缘。这让我心里越发没底。东张西望地上到四楼，见402静静地洞开着，像一个人张了嘴要打喷嚏，却始终打不出来。这是我该来的地方吗？

喊一声："喂！"

无人应。

我狐疑地抬了腿，迈过两寸高的门牙。

"来啦？"

随着这声更像喝问的招呼，从不同房间出来两个男人。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五六岁。确认了我是谁（证明我没走错），四十多岁的男人便说，他是户主，但不是房东，这套三室一厅，是他从房东那里租过来，他再单间租出去，那个年轻人，包括我，都和他签合同。我的合同年轻人已代签，钱也由他付了。年轻人叫我陈哥，接着又改口叫永安哥，说永安哥，这是俊哥，俊哥来镜城十多年了，在一家公司做财务。那被称为俊哥的，伸出粗短的手指刮头皮；只有头皮，没有头发，一根也没有。

然后年轻人把我领进我的房间，说这房间靠东。东南西北我也分辨不清，我的世界是由前后左右构成的。而且是否靠东，也无关紧要。

但年轻人说，这房间比别的房间，至少早亮半分钟。

又是一句聪明话。

到镜城两个钟头，我就听到了两句聪明话。

房间小得很。不过无所谓，能搁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够了。我放包时，年轻人把门关上，细声说，俊哥名叫冉俊，是个从头到脚的失败者，平时少和他接触。出来混事，不成功的话不说，不成功的事不做，不成功的人不交往，这是原则，否则混不出个名堂的。说完让我休息，想洗澡就去洗个澡，20分钟后，他再来叫我吃饭。

待他出去，我在床沿坐了，抠着脑门想：他是谁呢？为什么要替我付房租呢？

怎么也想不起来。

镜城我是来过的，但西南门是第一次来，这个社区，社区里的这个居民区，居民区里的这套房子，自然更加陌生。正因此，感觉镜城也是头回涉足，凉薄荒疏，与我川西普光市的家，雁阵声寒，关山隔绝。镜城也并非没有熟人，却大多联系不上，联系上了也路途遥远，无法相见，仿佛他们所在的镜城和我正待着的镜城，不是同一个镜城。事实上也是。再大的地界，能给人意义的，只是某条街道，某个门牌；甚至比这还要小，小到立锥之地，正如一粒种子，是在指头大的土块里发芽。

没有人能帮我。

我能依靠的，只有这个几平方米的房间，还有替我付房租的那个年轻人。

"依靠"这个词，让我的记忆复苏：是那年轻人叫我来写剧本的。

他叫谢延，我想起来了！

天光还在城市的那一边，谢延就来敲门。

听声音他很不满意，嫌我起来得晚了。

"我那里都亮了。"他说。

我这才知道，"至少早亮半分钟"，并不是一句单纯的聪明话。我是他的雇工，他要我比别人早起。

门刚打开，谢延说："今天就看你的了。"

原来是要去跟他们公司领导见面，导演也要来。

"这个剧，"他继续说，声音像捏着橡皮管浇花，"是国内少见的大制作，要投资两个亿。两个亿的人民币有多重？一张百元钞1.15克，1万块就是115克，一亿是1150公斤，两亿呢？2300公斤，或者说2.3吨。从天上砸下一颗2.3吨重的陨石，能毁掉一座城。砸钱不是毁城，是要听响声，钱自己不会响，是人让钱响。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不是穿上长衫就能称秀才，会用电脑就能当编剧。我不全力举荐，挑剩了，也挑不到你头上，你说是不是？"

我房间没开灯，客厅也没开灯，但他的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光。

他显然是在等我的回答。

我只好说："那是。"

感觉口气僵硬了些，又补充说："谢谢小谢。"

他本是一只手把住门枋，现在两只手把住，相当于把我堵在里面，堵严实了，才说："你平时这样称呼我无所谓，到了正式场合，就不能叫我小谢，也不能叫谢延，要叫谢经理。"

我连忙点头。这个比我小十来岁的人，原来是个经理。

"我也不会叫你陈哥或者永安哥，我就叫你陈永安。"

我说那当然，语气很是做小伏低了。

他沉默下来。沉默下来后就听见窗外的鸟叫，是一呼一应的叫法。

"演习一下吧。"他说。

我说好。

"陈永安。"

"谢经理。"

"陈永安！"

"谢经理！"

……

早饭是出去吃。下楼来，踩在水泥地上，却像踩在云端里。那不是路，是路的影子。每踏一脚，都溅起深灰色的光斑。天在慢慢亮开，但依然不能叫白天。外面的小街倒是早就热闹起来了。热闹的是气息，不是声音。几乎听不到声音。昨天我来的时候，街上空落落的，现在有了十余家移动餐点，都是类似于乡间演出队的那种铁皮箱，遍身黑，黑得遗忘般遒劲。马路对面半尺高处，有片略微倾斜的台地，餐点就摆在台地上。谢延领着我，径直走到一个胸大腰圆的妇人面前。那妇人奇怪地叫他张老师，说张老师，坐。也不问他吃什么，看来他是常客，且万古不变地吃同一种食物，也吃同样的分量。

谢延坐了，说："两碗啊。"

妇人应着，麻利地在铁皮箱里捅火。

炭火迸出即闪即逝的星子。

我跟谢延坐在同一根条凳上，他歪了歪屁股，凑近我耳边，说："对外人，不能轻易透露身份。"我很懂事地点着头。他本来姓谢，却说姓张，正如多年前有一回，我跟一个朋友去夜总会，进了包间，他问我："孙总，喝啥子酒？"

这么说来，不透露身份的意思，是随机改变身份。变，是最深的隐藏。

"人与人的根本区别，"谢延进一步说，"不是别的，是身份。你出去见人，不是人见人，是身份见身份。人是说不清的，身份却一目了然。因此人最重要的，是别在'人'字上纠结，苍天大步朝前走，你却在那里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不是扯淡吗？是人又怎样的？卫懿公养鹤，给鹤穿锦衣绣服，并举行大典，为鹤封官晋爵，鹤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晋灵公养狗，为狗建别墅，用礼器盛食请狗吃，谁不小心碰了他的狗，就砍断谁的脚；前不久有则新闻，路人赞美一条狗，说好漂亮的狗！结果挨了狗主人一顿暴打，原因是他的狗不叫狗，叫犬。过分吗？事情过分，道理不过分。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什么是名？名分嘛！把名分稍作转化，就成了身份。名分和身份，一个属政治结构，一个属社会结构，但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所以，"他脖子一扭，作了总结，"是不是人不重要，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也不重要，身份才重要。身份是大哥，别的都是马仔！"

地上更亮些了，天空却比开始还要暗淡。是暗在深处，就像我的心。我想着我为什么出来混。是想挣钱，想出名，说白了就是想捞个身份。然而那是多么遥远，远若星辰。在这个比我小十来岁的人面前，他也是大哥，我是马仔。年龄屁都不是，用年龄来塑造伦理，是农业社会的伦理，不说已经过时，也正在过时。

书写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间世相

——读津子围长篇小说《苹果红了》

□王雨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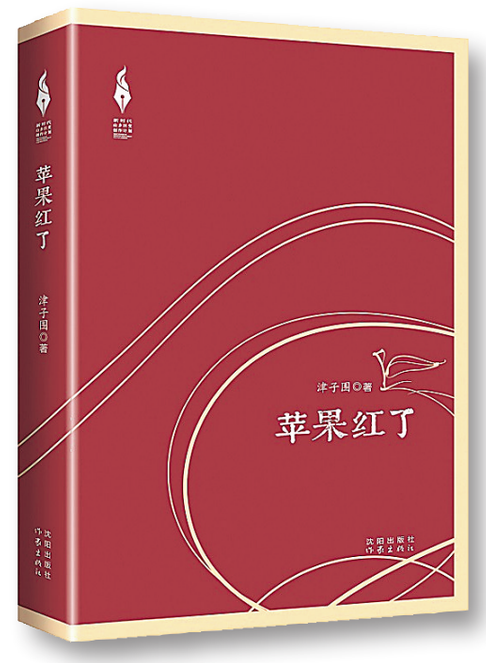
反映时代变迁，描绘普通人的精神新变，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旨归。观照现实、坚持真实，是紧扣时代脉搏、倾听时代声音的内在追求。

津子围的《苹果红了》是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现实题材作品。小说聚焦改革开放40年来，祖孙三代人的生活变迁，将代际差异、城乡变迁、市场经济转型、农村产业数字化升级等充满历史与时代记忆的话题，通过刘宝贵、梅子、雪芳三代人的生活铺展开来，充分展示了三代人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不同选择。作者用细密且真实的细节与快节奏的叙述方式，将宏大叙事与日常书写杂糅进故事的讲述之中。

小说分两个部分进行交叉叙事，一是刘宝贵一家人在世纪之交的生活经历，二是生物学海归女博士雪芳去山顶村种苹果创业的故事，重点聚焦三代人生活观念与时代变革的碰撞，深刻揭示了时代发展中普通人的生活新愿景。家族里的第一代从农民到工人，第二代从工人到知识分子，第三代又回到农村，从知识分子变成"新型农民"，展现了三代人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折射出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城乡变化。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情节跌宕起伏，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家族第一代刘宝贵是工厂退休老劳模，他的四个子女——大儿子刘跃进、二女儿石青、三女儿梅子、四儿子小革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经历了一系列人生转折。刘跃进作为长子，却缺乏凝聚一家人的担当；石青作为家庭中沉默的存在，虽有些人性中的自私，但也有对家人的关心和保护；梅子与长期两地分居的丈夫出现了婚姻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小革子，在社会上闯荡，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从街坊邻里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家长里短，到婚姻与爱情面临两难选择的人生难题，再到在利益面前失去理性判断的人性弱点，小说由表及里，见微知著，以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时代变迁，用平民化的视角写尽充满烟火气的人间百态。

与小洋楼往事相对照的，是"正在进行时"的果园创业故事。如果说小洋楼往事是一部群像剧，那么雪芳的故事则更突出"大女主"的形象。身为海归博士，承载家族期望的雪芳并没有留在大城市，做人们眼中光鲜亮丽的高薪工作，而是毅



《苹果红了》，津子围著，沈阳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4年4月

然决然回到农村，开辟一片新天地。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现实条件阻碍等种种困难，雪芳内心也曾经历过困惑、彷徨、动摇，但她最终顶住压力，决意到山顶村承包果园，通过引进高科技设施、改良苹果品种、打造新的品牌基地、网络直播带货等一系列新举措，使"牛顿苹果园"完成了从逐渐走下坡路的传统生产模式到拥有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华丽转身。

作者津子围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可以看出他在讲述小洋楼一家人的故事时，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时代的细枝末节都非常熟悉，因为是他熟悉的时代，是同代人的故事，所以写起来特别得心应手。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90后"的生活时，作家也写得非常真实，比如对"90后""00后"生活态度的概括，不知能否让他们产生共鸣呢？

小说中最真实鲜活的，莫过于人与人观念的碰撞。首先是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的差异，对于家族的第三代——"95后"的雪芳，小说重点突出了母女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差异和碰撞。母亲将人生的重心全部倾斜在女儿身上，期望她能按照自己规划的理想方向生活，甚至将女儿的成就当作自己最大的成就。但随着不断长大，开始独立思考的女儿拥有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逐渐脱离母亲预设的轨道，加上两代人生活时代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产生了很多摩擦与碰撞，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真实写照。其次是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差异，当雪芳决定用现代化科技改造老屋时，村民们多是不理解，在雪芳改造果园的过程中，小说也涉及了当前农村及创业公司所面临的诸多内生问题。传统乡土小说更注重以细腻笔触构建牧歌式的乡土伦理社会，津子围改写了这一范式，写出了反映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较长，故事情节发展与叙述节奏较快，读来令人有酣畅淋漓之感。故事涉及的人物众多，却都富有个性，没有流于扁平化、"工具人"的缺陷，关键就在于作家对个性化的语言和心理的把握。不同年龄、职业、出身的人物，所说出的话都是契合人物性格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频繁出现"苹果"意象，从苹果的起源、种植、生产，到伊甸园禁果、牛顿的苹果、乔布斯的苹果，再到艺术作品中的苹果，小说叙事由"苹果"意象生发，进而升华为融艺术、哲学、科学为一体的现实与想象之术。

自写作以来，津子围始终坚持对小人物的刻画、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人性深度的开掘，《苹果红了》既是一部回望时代变革的记忆之书，又是一部注目新时代发展的探索之作。作家将普通人的精神成长与时代脉动相连接，勾勒出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现实主义新世相，聚焦"当下"，演绎出平民百姓的又一部"人世间"。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GREAT CHANGES OF MOUNTAIN AREAS LITERARY PLAN FOR A NEW ERA

深入勘探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读长篇小说《时空轶事》

□石华鹏

长篇小说《时空轶事》在开篇出现的一个意象让我印象深刻，它仿佛是引导我们走进和理解这部小说的一道光亮，或者一把钥匙。

"我把目光扫向一排又一排晾晒的白被单，看见一簇春光在上面不停地晃动。忽地，我在一张被单上看见，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那一簇碎碎的春光淬溅在我涌出的泪水里，光斑扩大，欧阳兰消失了"。

——春日晴朗的一天，在被当地人称为"疯人院"的海舟医院的晒台上，"我"和她面对面坐在一张石桌旁，周围挂满了晾晒的白色被单。"我们"聊天时，出现了以上这一个场景。

那簇"不停地晃动的春光"，犹如一个巨大的隐喻和象征，为整部小说定下了时空交错、叙事迷幻、人生似梦的艺术基调。白被单上晃动的春光，让我们想起电影银幕，以及银幕上虚幻与真实交织的光影故事。事实上也是如此，小说中，白被单上出现的注视"我"的一双眼睛和在光斑中消失的欧阳兰，暗示了那是另一个"我"。"我和她面对面坐在一张石桌旁"，实则是"我"和"我"面对面而坐，50岁的住在海舟"疯人院"的欧阳兰与9岁的来自川北362基地的欧阳兰面对面而坐。她们聊天，并发现一个秘密："我看到了从前的我。是看到，不是想起。因为那个我还在那里。"

在那簇晃动的春光里，在时间的深处，有多个平行世界共存，有多个"我"同时存在着，她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这是《时空轶事》深层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对认识自我的一次复杂诘问。在对自我确认的游移不定中，小说的另一个诘问或者题旨随之而来：生活究竟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还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抑或是我们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当然，这不是穿越情节，也不是魔幻叙事。《时空轶事》是一部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果要给这种现实主义冠上名称的话，不妨称之为"轻逸现实主义"。说它"轻逸"，是因为其在叙事和题旨上所表现出的轻逸之感。小说叙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随主人公情绪和记忆的变化，在多重空间和时间中灵动切换，摆脱了叙事的繁复和冗长，直接与人物的精神世界勾连。另外，小说对自我与他我、记忆与存在等问题的探讨，是通过个案和感性的生活来完成，让深刻的心理问题探索有了一种灵动和确证之感。

围绕主人公欧阳兰，小说写了三个空间里的故事。其一，"走进红砖楼"，讲述欧阳兰少年时读书和成长的故事。欧阳兰随知识分子父母在川北大山深处的362基地（满足战备需求的能源试验场和后处理工程）生活，尽管物质匮乏，但常有小愿望得以满足的快乐。她结识了一生的好友许冬梅、周卫等，认识了敬业的草帽书记、邻居叔叔等

《时空轶事》，一笔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

人，也见识了家暴邻居和"女流氓"等。同时，处于成长期的少女欧阳兰身上，也浸染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如爱憎分明、道德洁癖、革命激情、善良纯粹等。其二，"风卷研究院"，这个故事开始时，欧阳兰已人到中年。她大学毕业后回到父母的家乡海舟，在江南应用物理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院长赵辉被"双规"，继而进了监狱，欧阳兰的精神也陷入"不可名状的焦虑"之中，"常常坠入虚无里，感觉自己一点点与时空脱节。我的内心一片空荡"。"我"的研究能力强，成了副院长，但在各种人事纠葛中，"我"的人生却陷入了某种绝望和无意义中。其三，"迷幻'疯人院'"。过度的焦虑和绝望，以及院士丈夫出轨学生的谣言，让"我"住进了"疯人院"，"在这里住久了，我常常有种恍惚迷离的感觉，在那个未知的平行世界里，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和事，都在这里不断被并置发生，不断被重新上演"。住在医院的治疗过程依然是自我疗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迷幻"的，去见到过去的"我"，去与记忆中的那些人"告别"，然后找到"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的答案，找到"生活究竟是活过的日子还是记忆中重现的日子"的答案。

三个故事，也是三个隐喻：物质贫乏的纯净时代，物质丰富的倦怠时代，以及精神困顿的自我疗愈时代。第一个故事的叙事清晰、舒缓，细节丰富，充满温情；第二个故事的叙事跳跃，节奏加快，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温情消失，焦躁的情绪弥漫在叙事中；第三个故事的叙事混乱，人事来回挪移，清晰度消失，带有了"迷幻"色彩。所有的叙事情态和风格特点都是人物精神世界的写照，三种叙事风格塑造着欧阳兰的心灵成长史和变迁史。

"哪一个是真正的我？""生活是我活过的日子还是记忆中重现的日子？"欧阳兰之所以发出灵魂深处的自我诘问，是因为她迷失了自我，在匆忙的、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中失去了意义，而自我诘问无疑是寻找和疗愈的方式之一。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的"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和倦怠"，"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这一精神状态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质。韩炳哲对这种倦怠社会的病症开出的药方是，"人们应该对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闲冥想的成分"。无疑，自我诘问构成了"悠闲冥想"的重要部分。欧阳兰的自我诘问遍布"风卷研究院"和"迷幻'疯人院'"两个部分的叙事中，尽管小说家给了我们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但答案是有的：那个纯净时代的"我"才是真正的"我"，那个时代中的"奉献者"草帽书记和"好人"邻居叔叔以及有成就的研究者"父亲"等等一批人，"他们总是重现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我"所珍惜和敬重的精神。

《时空轶事》是一部有着突出艺术想法的小说，它试图融合物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来进行叙事。三个故事开始之前都有一个简短的"引言"，"引言"涉及物理学和精神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有关人的幻想空间、宇宙中的平行世界、生活经历与记忆的复杂关系、第四维度的"命运之眼"，等等，这些知识并非突兀地"显示"，而是主人公欧阳兰——一位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研究员——对自己人生遭遇和命运的一种理论上的解释。这些知识既为小说的叙事想象力提供了合理性，也为欧阳兰的认识自我提供了学理上的解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时空轶事》在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上做到了紧密结合，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作了较为深入的勘探，尤其对倦怠社会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作了一种病理学上的呈现和阐释。

"见到你比我想象得还要好，你走出了焦虑的日子，非常好。"小说最后，过去的好友雯雯对欧阳兰说。"醒来时，我已经睡在海舟市理工大学我家里的床上，此刻是北京时间上午7:02。阳光透过窗帘急不可耐倾泻进来……"

"那簇晃动的春光"变成了"倾泻进来的阳光"，一切似乎变得美好起来了。

（作者系《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